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滇西抗战纪念馆中的历史回响与时代意义

黄子娴 张蕴

滇西抗战纪念馆(国殇墓园),是中国远征军将士魂归之所。从山川走出的士兵,倒在枪林弹雨之中,也在碑铭与讲述之中永生。位于腾冲城东南的国殇墓园,是滇西抗战纪念馆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片烈士长眠之地,也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它以庄严的纪念建筑群和持续传播的公共记忆,成为理解中国抗战精神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

滇西抗战的历史地位:边疆烽火中的国家命运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伟大历史篇章。地处滇西要隘的腾冲曾是抗战正面战场上的重要战地,滇西战役作为中国战场上决定性的一役,其重要性远超边陲之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封锁沿海与中部通道,中国对外交通日益依赖西南方向。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从昆明至缅甸腊戍,长约1146公里,成为中国抗战物资输入的“生命线”。此后,日军便将该地区视为战略打击目标。1942年,日军向缅甸发动全面进攻,盟军节节败退。应英国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敌。由于准备不足、地形不熟、指挥失误等原因,中国远征军最终损失惨重。滇西战役,也称“滇西反攻战役”,是中国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反攻之一,由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远征)与美国驻华航空兵联合发动。1944年,中国远征军以腾冲为首战,发起大规模反攻,开启滇西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这场战役不仅是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上独立收复失地,更是中缅印战区战略格局的关键转折点,为打通滇缅公路、援助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提供了重要保障。腾冲光复后,李根源先生倡议兴建陵园,在腾冲设立“忠烈祠”,并命名为“国殇墓园”,以慰忠魂、昭后世。墓园1944年冬动工兴建,1945年7月7日落成。

空间中的历史:从“纪念性场所”到“国家记忆场域”

2013年8月15日,滇西抗战纪念馆在墓园北侧新馆落成。展馆内分“血肉铸长城”“援缅防御战”“滇西烽火急”“得道者多助”“绝地大反攻”“胜利奏凯歌”六大主题板块,以文献、实物、模型、多媒体互动等方式呈现滇西抗战全貌。尤其珍贵的是包括作战地图、远征军士兵信件、战地日记等一手史料,使抗战从“国家叙事”落到具体的“个人命运”。陈列的每一件遗物都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曾经战士生活的一部分。透过这类微观叙事,观众能够更加真切感受到战争的血肉温度,从而完成情感共鸣与记忆认同。

滇西抗战纪念馆并不仅仅是一处博物馆或烈士陵园,它所承载的是一种空间化的记忆形态。在物质与象征的叠加中,它完成了历史的转译、情感的传达与国家意识的生成。国殇墓园占地八十余亩,以忠烈祠为核心,设有墓冢千余座,按照军衔、部队番号排列。墓冢统一白灰为基,既体现纪律与秩序,也表现战争的冷峻与悲悯。墓碑群中矗立着纪念碑,塔身铭刻“民族英雄永垂不朽”。这里不是简单的悼念场,而是鲜活的历史教育空间,每一块墓碑、每一处铭文,都是与当代对话的媒介。

记忆如何传播:媒体、仪式与“再生产”的纪念文化

每年“国际博物馆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腾冲光复日”等重要时间节点,腾冲国殇墓园都会举行祭奠活动,其中清明春祭和两岸共祭最具代表性。学校组织少先队员向烈士献花、退役老兵讲述抗战故事、市民自发扫墓等形式,使纪念活动逐渐“生活化”“常态化”,不仅保留庄严性,更增强参与性与传承性。而近年来,纪念馆也通过数字化平台,如虚拟馆藏展览等,扩大了其纪念功能的社会触达力,在网络空间中营造“全民悼念”的纪念氛围。

滇西抗战纪念馆深知历史传播不能仅靠静态展陈,于是逐步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如“远征军徽章”复制品、抗战主题邮票、纪念T恤等。这些产品使纪念内容得以随身携带,成为流动的历史记忆载体。与此同时,为推动文旅结合,云南省发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旅游十大线路,其中以滇西抗战文化为中心的线路“爱国戍边·幸福蝶变之旅”榜上有名。以国殇墓园为中心,联动龙陵松山战场遗址、司莫拉佤族村、滇缅公路、惠通桥等,构建“一线多点”的红色旅游格局。这种空间串联增强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时代语境中的意义重构:从“抗战记忆”到“民族认同”

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展厅,更是现实认同的熔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增强历史认同、文化认同。”



滇西抗战纪念碑 本报记者 雷桐苏摄



国殇墓园 本报记者 陈飞摄

抗战时期重要的边政著作:李郁高与《云南第四行政区概况》考论

梁初阳

抗战时期,随着国内外战局的变化,云南既是坚固大后方又是抗战最前线,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时期在政、学两界的倡导和激励下,国内兴起关注边疆和研究边政的热潮,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曾言:“留心边政者,考究治乱之迹,与夫山川人物,著录为书,刊布于世;其著者如……保山李郁高先生之《云南第四区概况》。”(《溯史》序,1947年)《云南第四行政区概况》于1945年石印出版,然流布不广,少有关注,至今未见专门的研究成果。对书籍的编篡及内容进行考察,可增进对抗战时期滇西边疆社会情况及相关研究的了解。

李郁高与《云南第四行政区概况》

李郁高(1891—1969),字鉴周,云南保山施甸县由旺镇人。幼年入读私塾,后考入保山省立第三师范学校。20世纪30年代,他曾两度出任云南文山县长,任上剿匪安民、发展经济,尤重文化教育,主持编修《续文山志》,并参与筹办文山“云南省立第四中学”。省民政厅官员考核评语为“心精力果,成绩可观”。李郁高思想开明,经中共党员李国栋动员,将文山县的公田公地、圣会谷租、魁会金、屠宰税等资金纳入办学经费,资助贫苦学生,深受农民拥护,也为李国栋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郁高随60军出滇抗日,任军需处长,亲历台儿庄战役。

1942年5月,日军由缅甸入侵滇西,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36师奉命驻防施甸怒江前线,师部驻扎在施甸由旺镇,李郁高慷慨腾出私人住宅供远征军使用,后成为驻第11集团军美军联络组及所属战地医院驻地。1944年,李郁高出任云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负责地方行政及治安事务。该区辖境包括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及临沧市沧源县等地,地处云南西南前沿,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为滇西抗战重要战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第6军各部退守此区驻防。期间,受“泛泰主义”驱使的泰国军队多次协同日军进犯西双版纳社会情况,均被击退,并与中国军队在中缅边境形成对峙。1945年初,随着盟军在缅北展开反攻,第6军93师主动出击,成功将日、泰军队驱离,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

同年夏,李郁高在战事中巡视全区,注重搜集边疆社会情况,据此编成《云南第四行政区概况》一书。全书约2.4万字,以地为经,以事为纬,系统记述各地历史沿革与社会现状,并在书末就交通、移民、国防、防疫、教育、开矿、经济作物、水电及林业等九方面提出边疆建设建议。该书成为抗战时期记录和研究滇西社会的重要著作。

记录抗战时期滇西边疆社会情况

《云南第四行政区概况》记录辖区内宁洱、思茅、墨江、景谷、镇沅、澜沧、车里(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

市)、佛海(今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峤(今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镇)、镇越(今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江城、六顺(今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等12县及宁江(今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往乡)、沧源2设治局,分为沿革、疆域、种族、户口、山川、文教、交通、物产、气候、防疫等10目,关于各县的面积、乡保甲、族群、人口(包括男女丁口及甲、乙级壮丁)、学校教育、交通里程、物产、病疫流行、医疗卫生等情况,记录多有详细数据,较为全面准确反映了抗战时期滇西边疆的社会情况。

本书保存了大量关于滇西抗战的珍贵史料,内容涵盖教育、物产与交通等多个方面。教育方面:车里“有中心小学五校,国民学校四校,边地小学二校,高小二班……前岁,泰匪战起,县境沦为战区,且受空袭影响,复经一度停办”;佛海“因受战事影响,奉令内迁。即本县设立之中心小学、国民学校等,亦均停闭。迨三十二年秋,地方情势稍稳,始将顶真、猛遮、猛满、曼拱、旧笋等五个中心学校先后恢复,计有学生三百余人”等。物产方面:“墨江出产,以他郎金厂之金矿为最著……年来复受战局影响,全厂业务愈形冷落”;佛海战前“以茶叶及樟脑为第一出品,过去之茶叶出口,每年曾至二万担之纪录,樟脑年产亦二百余驮”;南峤“茶业年产二千余驮,樟脑三四百

驮,惟近因战事影响,无法外运”;镇越“茶叶亦为出产大宗,惟自越南交通断绝后,销路为之大阻”等。交通方面:思茅“去岁(三十三年),因军事上之需要,改筑飞机场于漫连村田,长一千六百公尺,阔一百公尺。最近运输等机,于春冬二季随时可以降落”;车里“惟山岭高峻,道路崎岖,尤以战事发动之后,途间住户迁徙,食宿甚感不便”;“镇越万山丛胜,河流遍野,既乏航运,复未通车。仅有人行干道……均因抗战关系,早已奉令破坏”等。这些史料准确详实,对深化滇西抗战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提出建设西南边疆的爱国主张

李郁高称编纂《云南第四行政区概况》目的是“将遐邇之全貌,呈献于国人之前,以冀急起直追,锐意经营……既固国防,复裕民生,固族前途,实深利赖!”其建设祖国西南边疆的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李郁高关于建设西南边疆的主张,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自滇缅勘界,而南段未定界中,我领土主权之丧失者不知凡几矣。与言及此,能无痛愤!夫我国抗战八载,胜利在望,国际地位显已提高。此后朝野上下努力于建国复兴之余,收复失地,固自易易”;在保护民族利益方面:“卡瓦山遍地遍处矿藏,驰名远近。最著者为班洪炉房之银矿,在明末即经吴尚贤之开采,得矿甚旺,故英人垂涎已久,致引起前此之班洪事件,幸卡民内向,坚决抵抗,后经一度

之会勘,闻该地亦划归英属。旋以抗战军兴,界务中辍,现胜利在望,异日界务重勘时,尚冀当局者握理力争,俾无限宝藏得以珠还也”。书中还记录政府治理边疆的艰苦努力:宁江设治局“地方瘴毒恶劣,外来人士死亡率甚大,自设治迄今二十四年中,官经二十二任,其中以在任病故者居多。”边地官员不畏生死、励精图治建设祖国边疆的无畏精神,令人动容。

李郁高在书中还热情描绘建设滇西边疆的美好前景:“车、佛、南等县,以农产胜;澜、沧等县,以矿产胜。资源之丰,罕与伦比。诚能及时经营,尽量开发,实不啻为吾滇之外府,取精多而用物宏,富强之基,于是焉是赖。抑尤有进者,车、佛、南一带,山川明秀,风物清嘉,自然环境之优美,方诸江南名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日开发告成,中原人士,暇肯来游,必有留连而忘返者。”笔下的云南边疆物产丰饶,景色优美,激起读者美好向往之情。

李郁高编纂《云南第四行政区概况》,不仅系统记录了滇西抗战时期的社会状况,更展现出深切的爱国情怀与边疆忧思。该书以详实的史料将边疆治理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边政学者以学术报国、以知识守土的时代担当。其内容至今仍为理解滇西历史、深化抗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是一部融史料性、思想性与爱国精神于一体的重要的边政著作。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

云南文史

大理公鱼皆有子:一种古代知识景观的呈现

李立

洱海弓鱼,学名大理裂腹鱼,属鲤科裂腹鱼亚科弓鱼属。该属鱼类因跃出水面时形如弯弓而得名,其下种类繁多,而大理洱海所产仅为其中之一。弓鱼味道鲜美,被誉为“洱海之花”。相传每逢春季月圆之夜,群鱼接连跃水、口尾相衔,状若弯弓跃向明月,故有“弓鱼奔月”之说。“弓鱼”之得名,源自肉眼远观与诗意想象;而“裂腹鱼”之称及其数十种下属类型的细微差异,则需近观鱼身,依据分类知识详加辨析——这对古代文人而言,尤为困难。

“弓鱼”一词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所引《临海水土记》:“弓鱼,长三寸,似鲋鱼。”明代杨慎《异鱼图赞》及清代胡世安所作笺注,皆收录于《四库全书》,文字稍异。《异鱼图赞》称:“西洱弓鱼,三寸其脰。惟书以‘公’,者是字谬,又咽多子,亦孔之羞。”杨慎指出,弓鱼在《鱼谱》(今已佚)中有载,时人误“弓”为“公”,并衍生出“大理公鱼皆有子,云南和尚岂无儿”之谜语。《太平御览》所载《临海水土记》之“弓鱼”亦“长三寸”,与洱海弓鱼尺寸相合,并非偶然,推测《鱼谱》与该书可能存在间接关联。清《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七十九亦有相关引述:“弓鱼,长三寸,似鲋鱼。见临海水记。杨慎曰:弓,俗误作公。《事物纪原》云:公鱼,似鲈,细鳞,长不满尺,有子,美(应为‘味美’),出大理。”

嘉靖年间,云南保山人张志淳《南园漫录》考辨“工鱼”:“大理出鱼,细鳞而纤长,长不盈尺,多腹腴而味美,名曰工鱼。《云南志》载之,谓土人不识汉字,因误为工,其说非妄。盖古韵江有工音,如陶渊明《停云》诗‘时雨濛濛,平陆成江’,李翱《别灞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晓文义,故用古韵,岂昧一江字乎?兹非土人不识字,乃修志者不识字耳。当时阁老陈公文为云南布政使,实总裁之,顾亦不察!”此处的《云南志》即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陈文时为宜南右布政使,主持志书修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原文为“一云江鱼,土人呼江为公,故名公鱼”,张志淳引用有误,其借题发挥主要想表达的是云南人不吝小蠹之意。稍后,曾宦游云南的谢肇淛在天启《滇略》做了一个综合,其中提及“大理公鱼皆有子,云南和尚岂无儿”并非杨慎语,而是杨慎所引滇中土人俗语。

关于“云南和尚岂无儿”,明崇祯三年刊刻的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将之与大理本土的阿叱力僧联系,其“大理府志胜”卷十五曰:“阿叱力,一名阿闍黎,有室家,能诵咒制龙,相传,大士制邪龙时留有遗法,谓之师僧。有妻子,读儒书,段氏而上设科选士皆此辈。杨用修戏语云:‘大理公鱼皆有子,云南和尚岂无儿’。阿叱力僧有家室、妻子,说明云南和尚有儿,曹学佺以一本正经的方式调侃杨慎记录的滇中戏语。康熙四十年成书的《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二“鳞介部”:“弓鱼,见《鱼谱》,滇中误作‘公鱼’而怪其有子。”此处愈发脱离原初语境,将滇中戏语当真,如同张志淳批评的,评了个小蠹滇人的毛病。

嘉庆年间,桂馥《滇游续笔》记:“吴才老谓滇语呼‘江’为‘公’,故名‘江鱼’为‘公鱼’。案,‘公’当为‘工’,‘江’从‘工’得声也。西洱河所出六寸之小鱼,今犹呼‘工鱼’。”吴械,字才老,宋代音韵学家,著有《韵补》等书。桂馥区分“公鱼”与“工鱼”的不同说法,对江、工二字的音韵、训诂之法与张志淳基本相同。差不多同一时期,檀萃在其《滇海虞衡志》考辨:“工鱼,出大理,长三四寸,满肚子,可充盞,炖肉而陈(有的版本作‘冻’)之。禄劝易龙河亦出此鱼。工或作弓。《南园录》谓:‘应作工,工为江,江色也。’此亦牵强。蜃名无正字,工、弓随用耳。”《南园录》即《南园漫录》,檀萃引此书,引得不准确,没有完全反映张志淳原意。檀萃认为民族语言以汉字记音,可以随意选择汉字,汉语的音韵、训诂对之无效。不过,公鱼、工鱼或弓鱼均是汉语词汇,并非民族语言即“蜃名”的记音。

在咸丰《邓川州志》记载的“工鱼”基础上,光绪三十三年杨琮《滇中琐记》如是说:“邓川有弓鱼,生洱海中,色如银,狭长如鲈,无鳞少骨,味鲜美,衔尾而跃,形如张弓,因以得名。”杨琮指出“弓鱼”得名由来,不过,此说显然只是针对“弓鱼”之“弓”的形象解释而已。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工鱼,一作公鱼或弓鱼。似鲈而鳞细,长不满尺,肉细刺少,子腴美,可随食。大理、弥渡、凤仪特产。”虽然以“考”为名,对“工鱼”的认识并无太多增长。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一称“洱海产鱼虾最富,以弓鱼味最美”。《滇西兵要界务图注》产生于“片马事件”后勘察云南边疆、化解政治危机的实际需要,或马生涯中的李根源不忘为弓鱼味记录上一笔。

除方志、笔记、文人诗歌中也有“弓鱼”留下的痕迹,最有意味的,当属乾隆年间大理文人师范的《西洱河弓鱼》。其中,有“洱江鱼所国,弓鱼实称首。弓公或异书,未知又何取。但期饱嘉味,字形不暇究”之句,师范承认自己不清楚究竟基于何种意义而有“公鱼”“弓鱼”的不同写法。作为诗人,他更欣赏弓鱼的美味,在大理湖边的欢聚。

孔子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历来存在两种理解:其一认为可证《诗经》识得名物,其二则强调《诗经》的入伦教化远重于草木认知。前者近于宋儒所称“闻见之知”,后者则推崇“德性之知”,以为高于闻见。不论何种解读,孔子于未端在价值立场上实一脉相承——皆不重视现代意义上的经验实证,更关注鸟兽草木之“名”而非其“实”。名物考辨往往依托古籍,重视对自然之物的制度规范与分类秩序,而非实物本身。因此,杨慎考“弓鱼”溯于《鱼谱》,张志淳、桂馥则从古音韵角度辨析“工”“江”之关联。最终,因历史巧合,杨慎所主张的“弓鱼”竟与现代科学命名相合,致使“弓鱼”一说胜出,而“大理公鱼皆有子”亦不再被视作笑谈。

透过古代文献中关于“弓鱼”名称的纷纭考辨,我们得以窥见一种迥异于现代科学认知的传统知识建构方式。古人所关注的,并非鱼类本身的生物属性,而是其命名背后的制度渊源、用字规范与道德隐喻。我们要从这些角度去体会其命名与考辨行为背后深厚的人文关切与历史意识。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